

重 五 集 錦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重 五 集 錦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主 编：周勋初
执行主编：赵安东
执行副主编：丁 骏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五集锦: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周勋初主编.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80729-207-4

I. 重… II. ①江…②周…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②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C52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901 号

书 名 重五集锦
编 者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 编
主 编 周勋初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 546 号 邮编 210031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40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207-4
定 价 35.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周勋初

江苏为文化大省，自古以来人文荟萃。这里且不说西周之初泰伯入吴和春秋之时吴国崛起等早期的情况，就从中古之世的六朝算起，绵延至今也已有一二千年之久。历朝历代，人才辈出，在中国地域文化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江南之地，物产富饶，交通便捷，这为本地区的文士提供了学术活动的良好条件。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继承了前此的文化传统，凭借优越的生活环境，潜心学术，不断开拓，在各个历史阶段均曾推出自己的成果。2003 年时，我馆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出版了《馆员文存》一书作为纪念。如今又已过了五年，馆员又已积累了很多优秀成果，我馆乃再次编此《重五集锦》一书公之于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众多馆员虽已步入耄耋之年，然仍将秉承古训，奋斗不息，述作不辍，我馆则将继续编集成册，以之贡献于学界。

目 录

序	周勋初(1)
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	周勋初(1)
关于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问题	茅家琦(22)
说“诚”	业衍璋(42)
万象包罗 风神飘逸	
——论李白的七言绝句	金启华(47)
南京市秦淮区诗词志略	苏昌辽(57)
半个世纪的学术探求	曾华鹏(74)
常州派词作漫评之一	
——读周济《渡江云·杨花》	顾福生(88)
我与《翻译学》	黄 龙(91)
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划时代进步	
——纪念《中国历史地图集》边疆图组的几位	
前辈学者	陈得芝(96)
徐州楚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	王 恺(107)
诸葛亮的历史地位不容颠覆	余明侠(138)
凤凰台兴废考	邱 敏(146)
轿子的产生与发展	陈 振(153)

“大国之航”赞

- 兼及郑和若干史料析辨 梅汝恺(158)
再谈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方之光(180)
黄兴的逝世及其国葬典礼 陈长河(198)
蔡元培与“苏报案” 谭伯鲁(209)
蒋经国二三事 邵黎黎(217)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所记无锡独特的
寿庆习俗及其研究 顾文璧(222)

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前言 阮元与张肇岑

- 孤本《石鼓斋印谱》跋 卞孝萱(284)
评帖学与碑学 华人德(291)
创作要注意“度”的把握 李 罗(300)
试论“扬州八怪”画家汪士慎及其艺术 李万才(306)
略述二十世纪上半叶江苏的书画艺术活动 金成生(324)
忆念恩师徐悲鸿 谭 勇(338)
花鸟画创新之我见

花鸟画创新之我见 永远的回忆

- 重视题材和形式的全面开拓 张继馨(345)
中国画的美学品格与人文精神 张尔宾(351)

天下一高

- 试论高二适先生的书法成就 徐纯原(366)
唐代书画评论家张怀瓘 张执中(373)
庄重 绚丽 明快 谐和
——谈宋、元、明、清的工艺配色 吴 山(381)

-
- 关于宜兴紫砂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浦生(396)
宜兴紫砂原料和烧成的变迁 徐秀棠(405)
苏少卿对京剧的贡献 俞 律(418)
金陵琴人琴事录 刘正春(424)
赵松庭笛艺的有“法”与无“法” 林克仁(439)
- “九十学步”四首 瓦 翁(442)
“咏汉事”等四首 业衍璋(443)
琅琊山胜概重光记 曹大铁(445)
“邓小平颂”等三首 李为扬(447)
“过虎门祭林则徐”等四首 仲贞子(449)
“辛弃疾陈亮鹅湖之会歌”等二首 常国武(451)
“咏浦口汤泉银杏次国武兄韵”等三首 俞 律(452)
“黄山行”等二首 单人耘(454)
“望海潮”等四首 余明侠(457)
“八十感怀”三首 范汝寅(459)
“浣溪沙”二首 顾福生(460)
匡亚明先生礼赞 邵黎黎(461)
“题荷”等二首 徐纯原(462)
“游都门古刹潭柘寺”等八首 马奉信(463)
“改革开放 30 周年庆”等二首 张执中(467)
“艺术颂”等二首 朱寿友(468)
“咏瀑四题”等二首 赵安东(472)

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

周勋初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新编写的文学史层出不穷。大家深深感到建国之后出现的几种文学史，不论是集体编写的还是个人撰述的，尽管都有很多优胜之处，但受教条主义的影响，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只是批评他人容易，自己动手却又犯难，于是学术界又有了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要求。90 年代起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热潮。我对此事本无置喙的餘地，因为我既没有编写过什么文学史，甚至没有认真地读过一种文学史，只是身为高等院校中的一名古代文学教师，自难摆脱这一潮流的影响。今将有关文学史编写历史中的一些看法写出，供大家参考。

清代扬州学派中人对文学的探讨

中国之有文学史一类的读物出现，是从清末林传甲等人的著作开始的，这已成了学术界的共识。这些先驱人物编写的文学史，受到日本等国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古代学术界也一直在对文学的发展进行探索。作为清代学术主流的朴学家中，扬州学派一系人物，在此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焦循与阮元为扬州学派的主要人物。二人同时友好，探讨尤多，贡献更为突出。

大家知道，焦循在《易餘籥录》卷十五中提出了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著名论点，影响文学史的编写甚巨。今将有关文字引

录如下：

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载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其韦玄成父子以后之四言，则《三百篇》之馀气游魂。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而东方朔、刘向、王逸之骚，仍未脱周、楚之窠臼矣。其魏、晋以后之赋，则汉赋之馀气游魂也。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陈、周、隋，于此为盛。一变于晋之潘、陆，宋之颜、谢。易朴为雕，化奇为偶。然晋、宋以前，未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四声。自时厥后，变蹈厉为和柔。宣城（谢朓）、水部（何逊），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齐、梁者，枢纽于古、律之间者也。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陈子昂、张九龄、韦应物之五言古诗，不出汉魏人之所范围。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观）、柳（永）、苏（轼）、晁（补之），后则周（密）、吴（文英）、姜（夔）、蒋（捷），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其诗人之有西昆、西江诸派，不过唐人之绪馀，不足评其乖合矣。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归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而李（梦阳）、何（大复）、王（世贞）、李（攀龙）之流，乃沾沾于诗，自命复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

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偶与人论诗，而纪于此。

值得探讨的是，一代朴学大师焦循怎么会提出这一著名论点的呢？

清代朴学，有吴派、皖派之别。清代中期，扬州学派崛起，这一流派中人除了奄有上述两派的治学特点之外，还出现了另一种“闳通”的气象。张舜徽以为该学派的学风为“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能“运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分析事物。……推广了求知的领域”。^①

扬州学派中人除了在经史、小学等领域中继续作出贡献之外，还很重视词章之学。例如该学派中早期的杰出人物汪中，就以骈散兼行的创作成就享誉一时。焦循于此亦有所成，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曰：“焦里堂（循），江都人，朴厚笃学，邃于经义，……余事为诗词，亦皆老成。”

刘毓崧在列数该学派中杰出人物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时，介绍其中关注骈文的一派，其特点为“奉《易·文言》为根底”；介绍关注诗歌的一派时则曰：“其深于古近体诗之学者，循风骚之比兴，乐府之声情，选楼、玉台之格调，以化裁隋唐后之诗，而非若浅率以为性灵，叫嚣以为雄肆也。”^②

这一提示表明，扬州学派中人由于倡导骈体而推崇六朝文学。阮元可为这一倾向的代表。他在与桐城派的抗争中，特别提出《文选》这一六朝时期产生的著名选集作为创作的榜样，因此由他倡导的文学流派即有《文选》派之称。

在我国过去的各个朝代中，六朝时期的文学观念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文人考察文学问题时，从政教着眼的倾向有所

^①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一章《叙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1—14 页。

^② 刘毓崧：《吴礼北〈竹西求友图〉序》，载《通义堂文集》卷九，《求恕斋丛书》本。

减弱，而从纯文学考察问题的倾向有所增强。梁代萧氏王室中人曾经提出过一些著名的观点，例如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等说，湘东王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等说，分从感情与辞采等方面阐发文学的特点，有与后代文学观念相合的地方，因而在清代中后期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萧统在《文选序》中还阐述了诗赋等文体之间的演变问题，且结合历史，对诗体的发展也作了考察与说明。这种历史眼光，在其时的几种史学著作中更有突出的表现。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以史家的眼光考察了文学的发展。他首先探讨了文学的起源，以为“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认为自有人类产生，即有文学出现，这无疑是一种符合近代文学研究者口味的观点。沈约随后从有文字记录的“周室既衰”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演变，一直叙到宋氏的“颜、谢腾声”，其间还列举名作，并附带提出了独得之秘的声律论，对古往今来的文学演变作了综合说明。

他所作的一些分析，很有参考价值，例如其中说到“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文中论及玄言诗的一段，成了后代文学史研究者无可替代的指导性意见。

又如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萧齐一代文学的分析，先从前此文学的发展叙起，以见文章的源流演变，而后又总结道：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

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这种分析，概括性强，甚为深入，可作后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

众所周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对前此文学的发展作了更为系统的考察，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论点，如论建安文学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一评述已成研究建安文学的权威意见，各家研究文字中无不征引。

刘勰在《时序》篇的开端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认为文学的发展，文风的递变，如能结合古今文士的心态与民情风俗而进行考察，都是可以阐述清楚的。文中还进一步总结道：“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种精辟的意见，一直指导着后世的文学史研究。

《文心雕龙》分为上、下篇。上篇之中，《明诗》以下的二十篇文章，分论数十种文体，《序志》篇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说明他在研究每一种文体时，都要追本溯源，考察流变，选取范文，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刘勰的作家、作品研究，都是置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的。这就可以说，《文心雕龙》上篇中的许多文字，都可视作文学史分体研究的专题论文。

刘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了总的考察和个别的考察，刘宋之前的文学发展历程也就清晰可辨。因此，当代的文学史研究者都把刘勰的有关论述作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文字看待。

唐代诗歌创作成就突出。宋人考察前代的文学问题时，大都关注诗学方面的成就。其时兴起的诗话一体，主要内容之一，就在总结唐人在诗歌方面的创作经验。严羽《沧浪诗话》中有《诗体》一章，“以人而论”部分，对作家的创作风格作了详细的论述；“以时而

论”部分，对时代风貌作了综合考察。以唐诗而言，就区分出了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等多种，而他在《诗辨》一章中又说：“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这不仅是因唐代多种诗体的创作均已取得丰硕成果，而且产生了李白、杜甫等一代宗师，可以雄视各代。

宋词、元曲的情况类同。这两种文体在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后人加以总结，也就会联想起唐诗的情况，从而以此作为时代的标志。元代罗宗信在为周德清《中原音韵》作序时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明代陈宏绪《寒夜录》卷上引卓人月之语曰：“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目的就在依据上述原理而遴选明代的代表文体。

比之唐诗、宋词的作者，元曲与明代民间文学的作者其身份已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大都是士族中人，后者则大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士子或一般平民。因此明清之后的文士起而将元曲等文体与唐诗、宋词并列，本身就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进步。清代朴学大师都是士族中人，其中一些人物起而推崇戏曲，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

清代扬州地区经济极为繁荣，各种娱乐活动极为丰富。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曰：“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反映了其时各种戏曲的风靡一时，这对那些兴趣广泛、视野开阔的文人来说，自然会引起关注。

焦循就是这么一位对戏曲极为热衷的朴学大师。他不但喜好雅部，而且热爱花部，且于二者均有著述。目下所传者，有《剧说》六卷与《花部农谭》一卷二书。《扬州画舫录》中还记载着焦氏另一著作《曲考》的部分内容。他不但兴致勃勃地观看演出，而且博征载籍，对戏曲的故事和脚本作广泛的考索，于此可见其文学史观的

宏通与深入。

阮元与焦循为姻亲，熟知其为学特点，他在《通儒扬州焦君传》中说：“君每得一书，必识其颠末。或朋友之书，无虑经史子集，即小说、词曲，亦必读之至再，心有所契，则手录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编写成《里堂道听录》五十卷。”（《挚经室二集》卷四）

张舜徽在讨论扬州学派的特点时特别表扬了焦循的成就，强调他有科学的态度，并曰：“这种分析事物的思想方法，体现在焦循的著述中，最为突出。他无论在阐明性理，讨论经学，教戒子弟等方面，都强调‘会通’，强调‘日新’；反对‘据守’，反对所谓‘定论’。他经常把事物看成是变化不居的、前进不停的。……由于他没有把事物看成一成不变，才能提出一系列新颖的见解。这种见解，影响了他周围的朋友和后起的学者，形成了比较活跃的学风。”^①

由上可知，扬州学派中的杰出人物焦循考察文学流变，观其会通，提出了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说明时代发展至此，已经具备了全面系统地总结文学发展的条件。焦循为《易》学大师，考察问题时自然具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观点，而他又曾对各种文体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样才能形成其完整的文学史观。

其后王国维、胡适等人也曾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②按照他们的哲学观点而言，均受清末风行的进化论的影响，这与焦循植根于《易》学上的发展观不同。但王、胡二人均与清代朴学有很深的渊源，自然会受到扬州学派中人学术观点的影响，不大可能直接从元、明时代那些不太知名的文士那里去寻找理论支柱。他们所接受的，当是焦循这样识见高明的朴学大师的影响。

^①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一章《叙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1—14 页。

^② 王国维之说首见于《宋元戏曲考》，实为推重元曲的地位而提出；胡适之说首见于《文学改良刍议》，是为提倡白话文学改良而提出。

新式学堂的创建和学术流派的纷争

满清王朝自中期起，腐朽没落，窘态日益暴露。西洋各国挟其船坚炮利之势，打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国人迫于危亡，群思变革，清政府为挽救覆灭的噩运，也提出了推行新政的口号。尽管前进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但后人也应看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满清政府决定在教育制度上实行变革，废除行之千年的科举制，而代之以新型的学校，于是北方有京师大学堂的设置，南方有两江师范学堂等设置。

从统治者说来，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目的都在培养与选拔人才。科举制度的内容，不论是隋唐以来的进士或明经，抑或明清的八股取士，士子熟习的内容，突出儒家经典的训练。经学差不多综合了古时的一切学问。学校代兴，则仿西方学术的建制，重视分科教育。因此，筹建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官员，起始就在考虑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将士子的综合训练转向分科教育。

其时能对清政府发生影响的一些西方人士竞相提出建议，美国李佳白在《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中，共提出了八条建议，其三曰：

总学堂虽备有各等学问，然一人之聪明才力势不能兼学；兼学矣，亦必不能兼精。总学堂之内，必设各等专门学堂。其最要者，如政事律法学堂，格致学堂，矿学堂，工程学堂，农政学堂，博文学堂皆是。就学者才之所长，性之所近，入一专门学堂，各尽心力以学之，务造其极而止。^①

^① 载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五、京师大学堂”，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17页。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百熙奉派为管学大臣，续办京师大学堂。在他的推动下，次年七月十二日即以上谕的方式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大学分科仿日本例，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文学科内则分为七目。其后张之洞奉调内任，筹办学校的几位大臣以为张氏负天下重望，请其参与意见，张之洞等乃重行商定，又以上谕的方式于光绪二十九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增设经学科，因而全部科目遂重行分为八科。张氏曰：“西国最重保存古学，亦系归专门者自行研究。古学之最可贵者无过经书。无识之徒喜新蔑古，乐放纵而恶闲检，惟恐经书一日不废，真乃不知西学西法者也。”^①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也反映了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时特定的国情。

侯官林传甲于宣统二年(1910)六月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一书，这是他任教京师大学堂时所编的讲义，贯彻了学堂章程中所规定的要求。全书共分十六篇，第一篇至第三篇分论文字、音韵、训诂，第四篇至第六篇讲古今文章内容作法之流变，第七至第十一篇讲经、史、子之文，第十二至十四篇讲汉魏至“今”文体，第十五、十六两篇讲骈散两种文体。从今人看来，实属体系庞杂，文学观念不清，但却正是这一时代的人学术观点的典型写照。清代后期学人对此有共识，学习文学而无经、史、子方面的知识，则如无本之木；学习经、史、子而不从小学入手，则入门不正，难以取得成绩。由此可知，这是乾嘉朴学兴起之后形成的传统，林著文学史这一大学教材，充分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再从林著末篇来看，可知当时的人颇为关注骈散之争。创作领域纷纭扰攘，从各家的争议中也可看出人们正在对中国文学特点进行探索。

自清初方苞等人创建桐城派始，直到清末民初，这一注重散文

^① 转引自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中国教育》卷上，1931年版，第83—85页。

写作的流派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桐城派推重义理，规仿唐宋古文，宣扬程朱理学，自然会得到朝廷的青睐。同治之时，曾国藩等继起，形成了更大的声势。尽管方苞之时已有不少人起而攻之，但却无法动摇其文坛上的正统地位。

阮元援引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说，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主张文必有韵。他又以为文章必须注重比偶，于是又引《易经》中的《文言》张大其说。他在《文韵说》中还提出：“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要求奉骈文为正宗，把散文逐出文苑。这一主张当然也是很片面的。但他根据我国文学的特点而立论，强调文学创作应该珍视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则又有其合理性，这是号称《文选》派的文学主张能够取信于人的原因。

清代末年，学堂制起而代替科举制后，各大文派若想争取群众培养后学，必须在学堂中争得主导地位。清末民初，位于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桐城派的最后几位大师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林琴南等先后在该校任教，为桐城派争得了重要地位。但自民国四年（1915）起，章太炎的学生纷纷进入北京大学。章氏文学重魏晋，其弟子中也有多人爱好魏晋六朝文学，于是在桐城派占上风的地盘上揳入了新的因子。民国六年，刘师培拥袁世凯称帝失败，章太炎又改荐他至北京大学任教。于是《文选》派中人物逐渐排除了桐城势力。

刘师培是后期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阮元之遗绪，曾撰《文章源始》、《广阮氏〈文言说〉》等文，批判桐城派的以经史为文，要求创作时“以彰彰为主”。

刘师培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等讲义，宣扬魏晋六朝文学。这种观点，与其时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宣扬的观点，可谓桴鼓相应。刘氏的这一讲义也得到了爱好魏晋六朝文学的鲁迅的称赞，可见其影响之大。

但《文选》派的这种文学观点，却遭到了章太炎的强烈反对。他在《文学总略》一文中，探讨文学的特点，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为文学寻找一种新的定义。他开宗明义地说：“夫命其形质